

中国经济列车仍将跑得比其他地方的快

新常态下更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

■ 本报记者 梁振君



在博鳌亚洲论坛年年会多场分论坛上,嘉宾纷纷认为,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更注重增长的质量及改善环保问题。本报记者 王凯 摄

▶ 新常态将使中国经济从中低端进入到新高端

在全球产业分工大格局当中,中国经济和中国制造长期处于低端或中低端水平。新常态下,中国经济和中国制造能否变得“高大上”起来?

对此,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、名誉院长、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

林毅夫认为,中国是世界制造工厂,而且很多是劳动集约型的制造业。新常态将使中国经济从中低端进入到新高端,同时要刺激创新,这些都是和新常态相关的。

“新常态除了人们议论的中高端水平、中速发展之外,新常态的‘新’在过

去是政府投资为主,将来是市场为主,市场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。”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、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保育钧说,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主体,“新常态”能不能走好,关键在于能不能启动民间投资,让市场做主。

春华资本集团主席胡祖六认为,新常态意味着增长率下降,两位数的增长下降到个位数的增长,或者是增长方式的变化,即从政府主导型外向型转向为内需驱动消费型,制造业的经济增长转为高价值经济增长。

▶ 反腐才能创造平等环境,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

最近两年,中国反腐成效尤为显著。对于中国反腐行动,与会嘉宾无不感到欢欣鼓舞。

“我接触不少民营企业,他们很喜欢反腐败,因为腐败严重威胁着经济安全,影响中国经济发展。许多民营企

业在发展过程中感到不平等,反腐败就是平等,目前反腐败已取得阶段性成果,中国要由经济型常态向政治型常态适应,但政治型常态还没有完全建起来。习近平主席强调要重构政治型常态,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。”保育钧说。

胡祖六认为,从中长期而言,反腐败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,因为反腐败才能创造一个透明平等的环境。“在所谓的旧常态中,腐败是一个常态,往往是身居高位的人用他们手中的权力为相关利益群体带来好处,这伤害了人们的创业精神,

这是不公平的,也是没效率的。”他说:“中国以如此坚定的毅力反腐,这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十分积极,许多民营企业都期望有一个更加透明的环境,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越来越少,那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常态了。”

▶ 中国经济平均潜在增长率应在7%—9%之间

看中国经济,不能只看增长率,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大,现在增长7%左右的经济增量已相当可观,集聚的动能是过去两位数的增长都达不到的。未来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问题、面临的新的不确定风险也成为与会嘉宾讨论的焦点。

“我觉得最大的风险来自于错误的理念,因为我们面临着非常多的改革和转型的动作,而且有一些转型动作是必须的,比如有很多人认为污染和成长之间有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,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太快所以就污染了,但是我的

们把中国和印度做比较会发现过去34年中,印度的增长比中国的速度低4%,但污染比中国还要严重。”高盛资产管理业务前主席、首席经济学家Jim O’NEILL说:“此外,我们还注意到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关系,投资占中国GDP比例非常高,但消费的比例要尽快提高。我们必须关注在过去几年中,消费占GDP比例的调整,这些变化是由于消费增长所带来的,还是由于投资下降所带来的?投资是投向过剩产能领域,还是不足的领域,抑或绿色领域?投资是为了促进创新吗?是为了能

够促进工业行业升级的吗?”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,农民工居功至伟。如何才能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,共享经济发展成果?对此,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认为,农民工的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,因为涉及劳动力的迁移,中国不缺劳动力,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把劳动力进行调配,使得劳动力能够在城市留存下来。

“我觉得户口簿是核心障碍,公共服务是核心。”樊纲认为:“如何能够真正的保障农民工的平等?如

果要非常快速的做到这一点,归根到底是钱的问题,如果我们从一个切入点做起,比如给农民工子女提供教育,另外需要完善社保体系,如果有一个统一的社保体系,农民工的迁移将比较容易,整个系统和整个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将更有效率。”与会嘉宾认为,从过去35年的发展来看,10%的增长对中国经济来说是过热的,而7%—8%的增速是回归常态,中国的平均潜在增长率应该是7%—9%区间的增长。

(本报博鳌3月29日电)

经济新常态对海南的启示

■ 本报记者 梁振君

经济学家林毅夫1994年在其新书《中国的奇迹》中预测,到2015年,按购买力平价计算,中国经济的规模将超过美国。这一观点在当时被视为天方夜谭。而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研究,按购买力平价计算,中国的经济规模已于2014年超过美国。

抛开中国经济规模是否超过美国的争议,一个不争的事实是,30多年改革开放让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中国经济在亚洲迅速崛起,单从经济规模来看,中国经济已从昔日不起眼的角色迅速蜕变成世界经济“巨人”,中国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主要推动力的事实不容置疑。

与此同时,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

整期,低增长、低通胀、低需求同高失业、高债务、高泡沫等风险交织,主要经济走势和政策取向继续分化,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依然突出。中国经济也步入新常态,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。对于世界经济而言,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同样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机遇。

“一带一路”战略构想无疑是本届论坛最热门的话题之一。新常态下,中国正通过“一带一路”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战略打造对外开放的新格局,形成对外开放的新常态。中国经济要想更上一层楼,世界各经济体若想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,唯有坚持合作共赢、共同发展,迈向命运共同体。

对于中国而言,我国逐渐进入消费主导经济转型新时代,随着消费总量不断扩大和消费结构升级加快,日渐富裕

起来的13亿国人庞大的消费需求具有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突出优势,足以支撑任何形式的产业发展和产业创新,并带动经济结构的有效调整。

中国经济正处于换挡的关键时期,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,从既往的政府主导型外向型转向为内需驱动消费型,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,把转变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,狠抓改革攻坚,突出创新驱动,强化风险防控,在投资拉动作用有可能逐步下降的态势下,尽早使消费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。

对于正在抢抓“一带一路”机遇的海南而言,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占比已过半,加上海南没有化解制造业过剩产能的沉重包袱,也没有用巨额投入治理环境污染的历史欠账,海南

完全可以轻装上阵,更好更快地抢抓新常态带来的转型发展的历史机遇,努力打造中国旅游特区。

新常态下,海南须坚持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,大力培育优势特色产业,努力解决产业结构单一的突出矛盾等。在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同时,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,打造国际旅游岛升级版。

正如中改院海南发展研究所所长夏锋所说,经济发展新常态下,海南不要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,而是从追求数量扩张型转为注重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型,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转型,推动经济真正走上稳定、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。

这,便是中国经济新常态对海南的启示。

(本报博鳌3月29日电)

樊纲:

中国经济增长潜力还没用完

“

中国经济从过去两位数的高增长降到如今中低增长的说法并不可取。世界范围内7%的增长仍是高增长。现在讲“新常态”,过去10%也不会是“老常态”,是“变态”。回到7%到8%是回归常态,不需要悲观。

本报博鳌3月29日电(记者梁振君)持续30多年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的中国,最近轻踩了一下刹车,经济增速从原先的两位数调至7—8%区间。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的嘉宾和学者纷纷聚焦中国经济。对此,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表示,中国经济两位数的增长不是“老常态”,而是“变态”。根据其在机构的研究,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7%左右是完全可以达到的,从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等角度综合来看,中国的增长潜力没有用完。

樊纲认为,很多难以预测的不确定性都会影响短期经济发展,比如汇率的变化,甚至是突然爆发的国家间战争。长期来讲,科学技术一直在进步,世界一直在发展,人类总要向更高的水平发展。经济的发展和增长的大趋势是确定的。

就中国而言,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,中国经济体量大、韧性好、潜力足、回旋空间大、政策工具多。新常态下,中国将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,把转变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,更加扎实地推进经济发展,更加坚定地深化改革开放,更加充分地激发创造活力。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,中外经济合作也在同步提升,意味着给世界各国及各国企业提供新的合作契机。

樊纲表示,中国经济从过去两位数的高增长降到如今中低增长的说法并不可取。世界范围内7%的增长仍是高增长。现在讲“新常态”,过去10%也不会是“老常态”,是“变态”。他认为回到7%到8%是回归常态,不需要悲观。

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,正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,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,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。对此,樊纲表示,未来三十年,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将不断增强,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不断扩大。

“过去三十年,中国企业没有创新能力很正常。中国落后两百年,在追赶前需要学习、消化、吸收。”樊纲表示,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逐步走到前沿,下一个三十年,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一定会比过去要强,这有助于改善经济增长结构,帮助中国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。

与会嘉宾激辩 人民币是否该贬值

“

绝对不能以货币贬值作为交易的条件,通过操作汇率的方式并不会使得出口踏出目前的窘境。

——春华资本集团主席胡祖六

本报博鳌3月29日电(记者梁振君)“如果是贬值的话,将会使僵尸的公司继续存在下去。”在今天举行的“中国经济新常态”分论坛上,春华资本集团主席胡祖六作出上述表示。

中国经济发展正在步入新常态:经济韧性好、潜力足、回旋空间大。与此同时,中国经济在“三期叠加”效应下,近期经济下行和通缩压力较大,这是经济走向新常态的必然阵痛。

胡祖六认为,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环保建设上仍有很大的需求,尤其是人力资本、医疗健康这方面的投入是必要的,我们不需要便宜人民币促进增长。“如果是贬值的话,将会使僵尸的公司继续存在下去。”

“绝对不能以货币贬值作为交易的条件,通过操作汇率的方式并不会使得出口踏出目前的窘境。”胡祖六表示。

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、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保育钧对胡祖六的观点也表示赞同。

谈及人民币是否应贬值的问题时,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表示:“长期来讲不需要人民币贬值,但中国需要一点点短期的人民币贬值”。

“人民币已经升值这么多,实际汇率已经升了这么多了,如果对下降还是上升按照美元计算的话,我觉得中国需要一点点短期的人民币贬值。”樊纲说:“大家都在贬,有时候会造成一种不平衡,会使得人民币过于坚挺。中国的经济在进行调整,需要寻找平衡,但是这种平衡不可能只依赖于美元的作为和表现。”

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、名誉院长林毅夫认为,长期来看,中国经济可能会以7%的增速持续五年,在这样的展望下,中国依然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加快速,它会有一个汇率的再升值,短期来讲,如果大家都在竞争性贬值的话,人民币的贬值是为了寻求一种平衡。

“人民币加入SDR对中国来说是在政治边缘方面有更大的利益,而不是经济利益。特别是在国际交易过程中,中国应该继续推进汇率市场化的改革。汇率改革政策应该是正式步入正轨,当然希望人民币进入SDR,但是从经济角度来说没有多大的影响,从商业的角度来说,中国需要人民币贬值吗?不需要。”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Nicholas Lardy说。